

21.05.01

合江縣社會風土志

合江縣社會編輯部
編印公風土志

小序

风俗是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在一定时期形成的习尚。它有鲜明的区域性、连续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从家庭结构、宗教信仰、婚丧祭祀、衣食住行，乃至民谚歌谣等方面，可以反映一方吏治民情，道德教化，所谓“观风俗而政教之得失可鉴”。故古代帝王和地方官吏，颇重视观风问俗，体察民情，以便施其政教。

合江古代民风质朴，勤劳节俭，重祭祀，喜迷信。清末民初，受维新思想影响，剪发放足，自由婚姻，风气为之一变。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连年，匪祸迭起，烟毒泛滥，赌风炽烈，世风日下，满目疮痍。建国后，革除弊政，荡涤腐恶，开一代新风。惜十年动乱，良好社会风气遭到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社会风气始焕然一新。凡此种种，均记入书中，希望能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

旧志风俗，偏重祀典礼仪丧葬，连篇累牍不厌其详。今对无甚价值者皆不录。有的仅提要钩玄，举其概貌；同时尊重史实，注意选用典型资料，既写旧俗，也写新风，根据情况分类横排，按主次作详略处理，并非有闻必录，面面俱到。少数民族习俗，旧志均未记载，今按民族政策，一视同仁。

社会风土志为全志中难写的篇章之一，包括的范围之广，仅次于“政治篇”；涉及事物之杂，则是任何篇章所不及。且宗教、婚丧、节日等多无档案可稽，迷信、服饰、住宅等虽耳濡目染，却难作科学的组合和编纂，以方言而论，搜集、组合、注释之繁难，实非一般人可以理解。书中词语，积累时间就达两年之久。除平时静心思索外，还于闲谈中注意一鳞半爪，下乡调查，则留心群众读音，然后反复推敲，区分特色。然而有的词语，只有读音，而无法用汉字记录；有的词义只能意会，无法找确切语言注释。编写时实有捉襟见肘之感。而“传统美德”一章，查阅资料就有数十万字之多，尽管如此，仍不能尽如人意。

由于本篇涉及面既广且杂，又多关系日常生活，人人都可从自己角度议论得失，说长道短自然比任何篇章为多。编者当洗耳恭听，以便博采众议增删。章学诚先生“调解众议难”之叹，当不以为意。仰望读者诸君从编好本书出发，不吝赐教，幸甚！幸甚！

本篇初稿打印后，修志前辈祝寿东老师及各界知名人士，曾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有的还字斟句酌加以斧削，在此谨致谢忱！

凡例

一、本书上限不限，下限至一九八五年止。全书共六章三十三节。

二、建国前的习俗、节日、祭祀等，无意义者不选；选入者又根据情况宜详则详，宜略则略。

三、方言、谚语、歌谣多不胜收，特别是歇后语，民间流传者绝大多数与出版的专著相同，无全部收录必要，故仅选极少有地方特色者，为了检阅方便，按音序排列。

四、方言一般用读音最准的字代替，因此不能“望字生义”。凡与普通话读音相同（或基本相同）者不另注音，读音不同的用汉语拼音注音；有音无汉字可代替者用“□”表示，并在后面（ ）内注上拼音。有的词语举了例句。

五、有人提倡设“新风尚”一章，在具体编写中感到有违分类横排原则，某些史实很难处理，且有些新风与旧俗多有联系。为了便于编写，列“传统美德”一章。

六、建国以来的新新人事甚多，但档案资料很少，所录多来自报刊、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先代会资料和“信息快报”等。某些人物事迹因过于空洞简略，未能选入。一九八五年某些资料有待补充。

七、限于篇幅，“宗族”一章只举其大概，未乡乡都写。

八、为了阅读方便，对“宗教”、“帮会”等的源流略加记述。

目 录

小 序
凡 例

第一章 宗 族

第一节 宗 族.....	(1)
第二节 家 庭.....	(2)
第三节 宗 祠.....	(2)
第四节 族 规.....	(3)
第五节 族 谱.....	(4)
附：会 馆.....	(4)

第二章 宗教信仰

第一节 佛 教.....	(5)
第二节 道 教.....	(6)
第三节 天 主 教.....	(6)
第四节 基 督 教.....	(7)
第五节 寺观教堂.....	(8)
附：庙 会.....	(8)

第三章 帮 会

第一节 哥 老 会.....	(9)
第二节 大 成 会.....	(10)
第三节 青 帮.....	(10)
第四节 洪 门.....	(10)

第四章 会 道 门

第一节 一 贯 道.....	(11)
第二节 同 善 社 (堂)	(11)

第三节 从新慈善会..... (12)

第五章 风俗

第一节 祭祀	(13)
第二节 生日	(15)
第三节 婚姻	(16)
第四节 丧葬	(18)
第五节 交际	(19)
第六节 节日	(20)
第七节 传统美德	(25)
第八节 农村生活习尚	(32)
第九节 服饰	(33)
第十节 饮食	(36)
第十一节 住宅	(38)
第十二节 陋习	(39)

第六章 方言、谚语、歌谣、歇后语

第一节 方言	(42)
第二节 谚语	(50)
第三节 歌谣	(53)
第四节 歇后语	(55)

第一章 宗族

第一节 宗族

合江最古者的宗族，可考者为大桥区黄氏坝先姓。早在春秋时期周定王十年（前597年）即从山西奔四川，定居今泸州、合江一带。福宝、先市区的袁姓，则为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入贵州平定“叛乱”的袁世明的后代。元末农民战争中，从长江下游入蜀迁合江的，有白沙余姓、先滩杜姓、榕山杨姓等。而尧坝乡枉姓、榕右乡范姓等，其祖先则系明代迁入合江者。明朝末年，社会动乱，逃往贵州躲避的氏族甚多，清初迁回百余户，另有垫江、长寿、重庆等地五百多户迁入。全县纯属明代宗族共计二百余户。由于人口大量流散和死亡，清朝从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贵州等省移民入县，其中湖北籍占百分之六七十。即所谓“湖广填四川”。

聚族而居，为古代遗风。同一宗族的人，大都较集中地居住在一村一乡，至今仍有类似情况。三桥乡长江村黄氏坝，先氏宗族占总户数百分之五十四；焦滩乡老泸村旧时有“王半城”、“郑半城”，尧坝场有“周半场”、“李半场”，先滩场有“张半场”、“黄半场”，榕山镇有“蔡半场”之说。名门望族几乎各乡都有：城区的陆姓、贾姓、冯姓、胡姓、甘姓、魏姓、王姓、郑姓、文姓；望龙区的吴姓、李姓、陈姓、胡姓；白沙区的高姓、税姓、程姓、任姓、赵姓、宋姓；大桥区的丁姓、罗姓、卢姓、周姓、李姓；先市区的匡姓、贾姓、梁姓、李姓、喻姓、王姓、袁姓、金姓、查姓；九支区的吴姓、洪姓、邹姓、宋姓、袁姓、黄姓、赵姓、刘姓；凤鸣区的王姓、赵姓、冯姓、夏姓；榕山区的陈姓、范姓、曾姓、马姓、秦姓；福宝区的肖姓、韦姓、穆姓、何姓、汪姓、王姓；先滩区的张姓、杜姓、蒲姓、滕姓等等，都较有名。至于榕右乡的范、马、陈、李、牟、刘六大家族，尧坝乡的周、李、喻、王、任五大家族，以及白鹿乡的邓姓、施姓、牟姓；永安乡的朱姓、赵姓、晏姓；虎头乡的夏姓等等，都曾盛极一时。

家族中，一般推辈行最高而有德行声望的男性为族长。族长率领族人作好祭祀祖宗，修建祖坟宗祠，制定族规家法，编修族谱，管好祖先遗留财产，救济族中贫苦，教育同族子孙等事。对不贤不孝、为盗为娼、作奸犯科子孙，有惩罚处死等大权，而不受国家法律限制。新到任的地方长官，对地方世家大族族长也得拜访。为了宗族利益和个人恩怨，族长可利用职权，达到各种目的。宗族与宗族间，亦有互相斗争情况。民国时期，九支、榕山等区乡，有的宗族长期诉讼不止。在同一族中，因争夺遗产或坟山风水等事而斗争者，也时有所闻。

为了发展宗族势力，某些家族打破了地区界线，与县内外同姓不同宗的族众“合族”，或应邀参与县外同姓“联宗”，从而构成庞大的宗族势力。

建国后，随着封建势力的瓦解，宗族活动也停止。一九八〇年以后，由于外地影响，合

江宗族活动又开始出现，贵州的赵姓及外县某些姓氏又来县联宗合族。一些乡原来同宗的本家，又联合起来，共同商议修祖坟、献清明，研究族中纠纷等等。

第二节 家 庭

以血统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组成。清代和民国以四代、五代同居为美德，称“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这类家庭，多为世家大族，有的一家多达数十人。至于三代同堂者极为普遍。家庭中由家长（称当家人）一人统治，全家大小都得听从指挥，有理服从，无理也服从。一般是男人管外事，女人管内务。也有内外家务全由女人掌管者。家庭中穿衣吃饭用钱统一安排，开支庞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子女积极性。子女对长辈必须竭尽孝道，遵守家规。书香门第，多以《朱夫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作为教育子孙，治理家庭教材。子弟闹分家视为可耻。由于家大人多，管理不易，家长处事也难做到公平，因而姑嫂弟兄之间时有矛盾发生，往往在经济遭到困难或矛盾激化时而分裂。也有因当家人年高，恐死后子孙不和而分家者。

分家时多请房族长辈或至亲参加，家中财产先提留一份作为老一辈养赡，以防分家后无人过问。其余按弟兄人数均分。已嫁女儿不得享受，未嫁女儿留若干作为嫁妆。如果家无财产而负有债务，则按弟兄人数分摊偿还。父母生活一是由弟兄每月或每年给赡养金若干，一是父母轮流在几个儿子家生活，一月或半年、一年轮换，甚至有一天吃一家者，称为“吃零供”。另一办法是弟兄分工，谁负责谁的生活，至死不变。为了防止以后变卦，分家时共同订立约据，签字画押，一人保存一张，但分家后虐待父母长辈的却大有人在。

建国初期，只有极少“四世同堂”，而三代同居的家庭仍比较多。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凭做工分吃饭，由于劳力强弱有别，收入多少不同，有的善于计划，有的不会安排，有的勤俭，有的懒惰，因而子女多的家庭，结婚后大多分家另立门户。无劳力的父母有的“吃零供”，有的由儿子供给若干劳动工分，有的每年给若干粮食。家庭人口以四五人居多。一九七九年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无劳力父母的田土一般由儿子代种。随着独生子女户的增多，家庭人口一般为三四人。城镇家庭也都小型化。儿女参加工作或结婚后，大都自然分家。对待父母有的同居一起，侍奉赡养；有的定期或不定期寄钱作生活费用；有的分工照顾。但有的视父母为“包袱”，对老人谁也不管，甚至有打骂虐待父母现象。独生子女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独生儿子，所享受的待遇往往在祖父母之上，全家人都视为掌上明珠，关心照顾无微不至。

第三节 宗 祠

通称祠堂，为同族供奉祭祀祖先的处所。宗祠有管理规章，由族长会同各房共同制定。祠堂一般设祠正、祠副各一人，管理田产钱粮，经办祭祀，多推选较公正老实长辈担任，或由各房轮流任职。宗祠大多置有田产，收入主要作春秋二季祭祀之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

各房应至祠堂向祖先拜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日）全族老幼聚集祠堂，除祭祖外，并对入学中举当官的子孙予以奖励，或对贫困之家给予救济，结合教育处理族中不肖子孙。凡族中有喜庆大事，则通知各房会聚，演戏设宴祝贺。

全县宗祠城乡皆有，有的乡有多处，同属一姓的祠堂，有的乡就有两三处，规模大小不一。城区的冯氏宗祠、魏氏宗祠、胡氏宗祠，白果乡陈屋基的吴氏宗祠，鹿角乡的李氏宗祠，凤鸣的王氏宗祠，先市的匡氏宗祠，福宝的刘氏宗祠，榕右的陈氏宗祠等等，不可胜记。其中榕右乡陈氏宗祠为清末奉天东边兵备道陈本植修建，楼台亭阁，雕梁画栋。窗棂门檐的雕刻工艺，设计精工，变化多样，规模宏大壮观，至今大体完整，为县内少有。其他宗祠多已改作民房。

第四节 族 规

族规有的称为戒条，有的叫家训，由宗族各房共同制定，载于族谱，教育子孙遵守。内容大同小异，并随时代发展而演变，大都为忠孝节义，和睦邻里，勤俭持家，遵纪守法，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之类。清末民初，受新思想影响，有的提出禁止信巫师邪说，提倡迟婚等规定。化育乡《蒲氏族谱》所载“宗枋（bēng）要务十则”规定了宗祠祭祀管理条文。在《家训》中，提出忠国君、孝父母、敬长上、笃宗族、和兄弟、别夫妇、尊师友、睦乡邻、慎祭祀、务本业、尚勤俭、肃闺阃、严家教、供赋役、禁邪巫、学校当兴、讼当禁等三十条之多。而先滩的《杜氏族谱》还有《婚姻述要》篇，规定宗族子孙应当迟婚，禁女为人作妾，规定奖励读书、做官办法：小学毕业“奖钱三十千文”，中学毕业“奖钱六十千文”，大学毕业“奖钱一百二十千文。”当上县知事、营长之类的奖银八十两，当征收局长、连长之类的奖银五十两，当典狱官、排长之类奖银二十两，当司务长、巡长之类奖银十两。《袁氏族谱》族规规定，在春秋两季祭祀中，“凡本房读书子弟，无论大小，齐集祠（堂）内考读、背书。该主课衡定优劣，次早发榜，酌量奖赏”。族中“凡有不肖子孙，辱骂父母、祖父母者，若年幼无知，即加戒饬；年大知事，该族正考实，重扑二百。如再犯，甚至殴逆，立即送官严究”。“凡家贫亲老，为子者当勤苦孝养。倘兄弟推委不管，或外出不归，或重资财、薄父母，致孤独无靠者，查实扑二百，令其自新，不改，加倍重责”。“凡有不肖子孙，不立恒产、不务正业，以致或无聊，或老迈，并不在可矜可恤之中，毋许佔占宗祠栖止。违者通知该房族长、族正，传知各房房长等，会同理遣。若执拗，责以家法”。“本房子孙，如有为盗为娼，族正查明，重责二百。再犯，出首送官处治”。“子孙倚酒滋事，倚势平白欺人、骂人、打人，甚至贪小利、占便宜，不顾廉耻者，凭及族正扑四十，令其自新，再犯倍责。”“士农工商，各安本业，倘有在外招摇撞骗累及父母者，事小扑一百，令其改悔；若事大，不学好，立即出首处治。”“族中贫富贵贱贤愚不一，俱系一脉渊流，倘有视同膜外，倚富欺贫，恃强欺弱，凭及族正问明，秉公执理扑责，毋得奉情”。《杜氏族谱》规定：“族下有年满七旬者，每年于分授时给钱一千文，六旬乏嗣者给钱二千文，以示合族知敬老恤贫”。为使族规老幼皆知，永远遵照，除刊于族谱外，每年春秋宗祠祭祀时都要宣讲。“祭日之早膳后，延请族中品行端方，通晓文理者，将谱牒中家训戒条高声朗读，并将有关风化之格言，谆谆宣讲。各房长宜率族人静听，毋得喧哗，违者罚跪香一炷”。觉悟乡

王氏曾将族规刻石传世，教育后人。此外，有的家庭还制定家规家法，与族规大同小异。

以宗系民，自古皆然。旧的族规家法，对维系封建社会的道德，巩固社会秩序，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建国后，封建的族规家法已全部废除。一九八〇年以后，代之以乡规民约。

第五节 族 谱

为记录宗族演变历史、世系、字排、祠墓、祖辈传记、遗嘱、墓志等的谱牒。内容繁简不同，历来为世家大族所重视。《蒲氏族谱》规定：“谱牒当珍。谱中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孝子慈孙，目可得睹，口不可得言，收藏宜密，检阅宜勤，每逢祭期，务各带至祠中会看一次。倘有鼠侵虫蚀，油污垢秽，除重责其人外，另择贤能子孙收检。如有鬻谱卖宗，及眷写原本瞒众觅利者，族众黜之，不准入祠，并会众呈官，追谱治罪”。因此不少人家对族谱视若珍宝，代代相传，每二三十年续修一次，有“三世不修谱谓之不孝”之说。为了光宗耀祖，有的邀请达官题词，敬请显贵作序，或邀名人作传。《罗氏族谱》中所录清代乾隆戊午解元《太守罗先生（文思）行实》，即为山西巡抚蒋兆奎所著。《杜氏族谱序》则为解元魏效所作。民国时期也有省长、军长为作序题词者。

县中族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族制度及地方史资料：《袁氏族谱》中记有南宋末年族人袁猛、袁忠等在反对元兵战斗中殉难史实。《先氏族谱》记有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先坤朋在抗元斗争中与永川义士刘霖密谋收复神臂城（老泸州），诛叛将、泸州知州梅应春事。《陈氏族谱》记有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过县具体情况。《范氏族谱》记有清末民初范姓有留日学生六人，回国后范虞氏参加辛亥革命情况。并记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春三月，二房范绍文由日本回国，首倡新学、放脚及男子剪辫等，开风尚之先”。《李氏族谱》记有清咸丰年间，李文定命儿子率乡里健儿与外国传教士斗争事。这些资料很有历史价值。族谱中，还反映了合江人口迁徙情况，元末和明末农民起义时，从江西、湖北等省迁入县者占相当大比例。

建国后，族谱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遗物烧毁不少，但至今仍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版本有清代木刻，民国时期铅印、石印及手抄本。铅印本错讹较少，手抄本错漏较多。卷数有单卷本和多卷本。进宝乡《曾氏族谱》多达十二册，百万字左右，建国后有少数手抄本。一九八四年先市印刷厂代印《赵氏族谱》，为建国后第一部铅印族谱。近年，有侨居海外县人来信索取族谱，以便传之子孙，将来回归认祖不致乱宗。

一九八四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国档会字（1984）7号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指出家谱的重要价值。根据“通知”精神，选报了《蒲氏族谱》、《袁氏族谱》、《杜氏族谱》、《陈氏族谱》、《邹氏族谱》等数种。

附：会 馆

清康熙后，外省迁居县内人口增多，经商往来也较频繁，于是各依乡籍建立会馆，以为会聚之所，计有广东会馆、云南会馆、江西会馆、陕西会馆。民国时期先后消失。

第二章 宗教信仰

第一节 佛教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传入中国。传入合江大约在东晋时期。隋唐时产生天台、严华、禅宗、密宗等教派。合江百分之八十为临济宗，余为曹洞宗。民国初期有寺庙四百余座。信仰形式分两种：一为出家，到寺庙内供奉神佛，男称和尚，又名比丘；女称尼姑，又叫比丘尼。分住各庙，总称为僧。另一为在家供奉神佛，称居士。民国五年（1916年）全县有信奉者一千三百五十八人。信奉者遵守不杀生、不偷盗、不淫秽等清规戒律，以行善慈悲为本，宣扬因果报应，地狱轮回。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设想佛住的西方为“极乐世界”。入庙僧人皆须剃发受戒，终身不婚嫁，不吃荤腥，早晚烧香敬神，按时诵经念佛。入庙为僧多属自愿，也有富贵人家请人代替为僧者。僧众大部分出身贫苦，此外也有政治上的失意者，身世苦痛难以解脱者和不法无赖之徒，他们大多过的寄生生活，真正理解和认真研究佛教经典者甚少。寺庙中的僧人为了生活，常利用迷信聚敛钱财，地方官员也多支持赞助，因而善男信女捐赠资财，在所不惜。九支区法王寺在清代最兴盛时，即有田产七百余石，都是从民间信徒中募化而来。

为了传播教义，恢宏佛法，民国三十年（1941年）法王寺曾创办佛学院，省内外僧侣有三十七人前来就学。此外，笔架山云台寺等庙宇也派常彻等至镇江金山寺、南海普陀寺等地学习。

合江佛学社为佛教居士组织。民国十九年（1930年）寂林大师朝拜南海来县讲经，县绅刘畴九等要求皈依，遂筹建佛学社，设上街广慈寺，刘美堂首任社长。每逢朔望，聘请高僧讲经，举行膜拜。一九四五年后，增添释迦诞辰佛七等活动。

佛教机构，唐代起设僧会师，民国时撤销改设佛教会。合江佛教会建于民国十九年，以寺庙为集体会员。初期经费无着，无专职办事员，会务由朗空和尚办理。民国二十五年有佛教徒六百余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合江县政府饬令改组，更名为“四川省合江县佛教分会”，选居士夏亮工为理事长，东方、朗空和尚为副理事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改为理监事制。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根据中国佛教会指令，改分会为支会，设常务理事、常务监事，增设秘书、书记各一人，按东南西北四乡分设调研员，以催收按庙产租谷提取的常捐经费，排解诸山之间纠纷为任务。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按期改造，成员略有变更，制度仍旧。

建国初，寺庙多改为民房，僧众大多蓄发还俗，自食其力，民间信佛者也大大减少。但一九八〇年以后，乡间信佛者又逐渐增多。福宝区元兴乡大悲洞又有人重塑千手观音像，朝

拜者络绎不绝。白沙、先市、九支、凤鸣等地，也有塑像情况。烧香礼拜，还愿诵经等现象又有发展。

第二节 道 教

道教为中国汉族固有的宗教，源于古代巫术，东汉汉安元年（142年）张道陵创于四川崇庆县境内鹤鸣山，尊老子李耳为教主。后分丹鼎派和符录派。丹鼎派重炼丹求仙，讲求长生不老之术，信奉者称全真道人。符录派以符咒驱神逐鬼，超度亡魂，斋醮治病为事，俗称火居道士。合江信奉道教者多属符录派，以为人画符念咒驱鬼、超度亡人为职业，借以骗取钱财。束发居道观修炼者很少，最早为五代时梁国的王发兴，其后有隋代的刘珍。

清代和民国时期，每年中元节（旧历七月半）道士在监狱门口设坛诵经，超度囚犯鬼魂。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天干，县长张懋彝令道士在三清殿设坛求雨抗旱，历时月余，灾情并未解除。建国后。真正信奉道教者已无。

道教机构，明、清时设道会司。民国改设道教会。会址上街三清观，由县政府社会科领导。县属东南西北四乡分设道教评议会，管理该地区事务和道士工价。民国五年（1916年）有信奉者五百六十三人。民国二十五年有道教徒四百余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有会员一百三十四人，每人月捐经费一至二角。城区道士年终召开大会，有类行会。建国后自行解散。

④ 第三节 天 主 教

又称罗马教，为基督教的一派，崇拜天主（上帝）和耶稣基督，主张忍耐顺服，寄希望于未来。帝国主义用作侵略工具。

清咸丰六年（1856年）法国明司铎将天主教传入合江，在县城大桑坪街（仓坪上）开设医院，诊病施药。咸丰十年（1860年）迁百花亭街；福宝场也建立教堂。咸丰十一年，福宝教徒横行乡里，激起公愤，乡人李文定命儿子成生，“率里中健儿，出其不意，捣毁教堂，众人称快，教祸乃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宜宾教区副主教、法国人林茂德来城区皮家院（流水沟巷）设教堂，后迁百花亭兼任神甫。县人黄瑞清为教堂执事，经营财产。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教会依仗势力发展教徒，全县教徒达千余人，无赖地痞也加入教会，以教会为护身符行凶作恶。望龙、白沙、望川、先滩等场镇也设教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林茂德返宜宾，由杨××接任神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黄司铎购学坎上丁家住宅作教堂，并将教堂作男女小学。后购北乡茶憩亭义园作教友葬地。民国五年（1916年）有信奉者一千三百七十二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合江天主教会成立，县人黄瑞清任会长，宜宾教区派陈××任神甫，教会一切按神甫旨意办。民国二十年（1931年）神甫由喻汝盐继任直至一九四九年。

建国初的一九五三年，喻汝盐借清理庙产名义，发动教内骨干，向县人民政府申请革新

办教未成。政府劝其离境，合江天主教活动基本停止。至一九六三年仅有少数虔诚教徒三三两两礼拜念经。喻汝盐虽去江安，但与许××等少数教徒的联系未断，曾指示他们汇报教务活动情况。教徒王××等曾联名向人民政府申请设立教堂，恢复教会活动，未获批准。

第四节 基督教

又称耶稣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教派。信仰上帝创造并管理世界，尊崇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世主。唐代传入中国，至清代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传入合江比天主教迟。光绪二十六七年（1900年左右）德国人韩思玉牧师来县传教，寄居百花亭民房，每礼拜讲演一次，劝人为善，“可升天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乡（今望龙区）太慈寺和尚戒得加入基督教，将庙产田二百余石全部捐舍给韩牧师。韩公然接受，并捣毁寺庙神像改修教堂。地方团保不敢向上反映。绅士李松林向县控告外国人侵占土地。知县李镜清大怒，拘戒得和尚未得。而韩牧师却告诉知县，请通知原庙产佃户重新投佃。李镜清以关系教案，不得不理，遂传集各佃办理投佃手续。李松林闻讯也跟随到案，当面提出不能投佃。众人在韩牧师前默不作声。李松林挺身而出，极力阻止，并率佃户离去。韩牧师将情况向英领事汇报，并通知李知县。知县见松林理直气壮，不受外国人压制，即以“民心不服”告上司和洋务处。后经中外会查，以外人来华无侵占中国土地之理，令韩牧师回国，事乃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教堂迁中街万寿宫（今中心校）对门民房，约三年又迁稻谷仓，又二年移住中街邬家隔壁（今二轻局），以办华西小学、为贫民诊病施药，拢络民心，宣传教义，发展教徒。初时信教仅百余家，后不断发展，蔓延至各乡，场镇也设分办事处。民国五年（1916年）有信奉者八百四十七人。民国九年（1920年）英国人白松坡和申××两牧师来县，购盐仓巷居住，次迁稻谷仓设教堂。其后泸县温玉堂、王怀安，纳溪唐炳银，安徽省×××相继来合，发展教徒三十余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前后，外国传教士离合，人们已识破其侵略阴谋，信仰者大大减少。时合江基督教更名为“自立会泸县支会合江分会”，会长为陈功绩、张松龄，教务由泸县教会领导，直接向教会崔仁思联系工作。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教务由外省肖某负责。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合江县城遭日本飞机轰炸，教堂焚毁，教会始解散。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贵州赤水县基督教士陶茂德、英国牧师邓志刚来县属的先市、九支两地发展教徒，有李启明等十余个妇女参加。这批人死亡后，信仰者更少。建国后未闻有信奉者。

此外，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有五十多人信仰伊斯兰教。

《合江县社会风土志》

第五节 寺观教堂

佛教供神佛处称寺、庙（女尼住处又称庵），道教称观、宫，基督教、天主教称教堂。合江寺、庙、观、宫，民国初有四百二十七所，单城区就有五十所之多。其中白山区北寨山寺最古，创建于东汉末年，唐初开明时（619年）更建。次为马街毗卢寺，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规模最大，影响最宽者为九支区龙挂山法王寺，次为先滩区关口乡黑岩寺。教堂，城关、福宝场、望川场、白沙镇、望龙场均有。民国时，寺观一部分作为学校。建国后所有寺、庙、观、宫部分作机关学校，部分变为民房。唯法王寺和笔架山云台寺屋宇尚存。（见《文物名胜志》）

附：庙会

庙会为宗教迷信活动之一，全县城乡均有，时间不同，形式多样，大型庙会对繁荣商业，促进物资交流，开展文化活动等有一定作用。著名庙会有：

上九会——城内玄天宫，为玉皇大帝寿辰举办。每年农历正月初三至初八做道场，办酒席。正月初八出神游街时，仪仗队化装三班衙役、二十八宿、八洞神仙。玉皇大帝神像，坐上八人大轿，锣鼓喧天，彩旗翻飞，香烟缥缈。官员、绅士、巨商、名流参与行香，家家焚香秉烛，虔诚礼拜，观者万人空巷。白山区正月初八也有朝龙顶山寺玉皇大帝之举，每年达数千人，卖农具和狗肉是其特色，至今不衰。

火神会——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城内火神庙举办，为火神祝融寿辰。城内有火神五个，分管五个街段。办会分段举行，扎火船五艘抬着游街。至每家门口，都撮炭火一铲倒入船中，叫“扫火星”，以保一年无火灾。最后将火船抬至山上或河边焚化。

五祖会——祀五通神，城内和先市场、王场、白沙场均举办，时间不一。有的在农历四月底，有的在五月中旬。一般做道场五天以上，并抬神像及纸糊瘟船游街。出神时吆喝吼道，铁炮轰鸣，掌教身披法衣，头戴峨冠，手执宝剑，将瘟船送到沙湾河边放入江中，让其顺流东去，表示一方百姓免受瘟疫之灾。夜晚还在河中放河灯二三百盏。先市场的五祖会还请戏班演戏酬神。会期万商云集，购销两旺，赌场大开。哥老会各码头人物也前来赴会。出神时人山人海，前呼后拥，将五通爷爷抬至赤水河边大码头，对岸五通庙也将五通娘娘抬在河边与五通爷爷隔河相会，待瘟船下水漂流不见才依依惜别。

龙王会——祀龙王，每年五月二十日，凡有龙王庙宇地方都举办。白鹿乡龙王会尤为热闹，也唱戏酬神。

城隍会——祀护城之神，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城内城隍庙举办。乡间的尧坝场东岳庙也于五月举办，每次演会戏一二十天，有时一月以上，由各行业帮会出钱打醮酬神。城隍出驾时，仪仗队化装判官、小鬼、鸡足、无常，旗幡漫卷，鼓乐齐奏，热闹非凡。

其他有七月间的川主会，城乡有川主庙者举办，祭祀李冰治蜀有功。三月十五日财神会。四月二十八日药王会，敬神酬谢医生。五月二十三日单刀会，以及观音会、土地会等等。

多不胜计。会期最少一天，规模有的限于行帮，有的止于村邻，无非祈神保佑平安，人兴财发而已。至于跨县的神会活动，首推江津县石蟆口的大菩萨。每逢天旱，善男信女将神像从石蟆口抬至合江榕右乡龙王潭与二菩萨相会，每次多达一两千人相送，前后数日。

第三章 帮 会

第一节 哥老会

为天地会的支派，又称哥弟会、汉留，为清代民间密秘结社。首领称老大哥或大爷，俗称舵把子，互称袍哥。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太平天国失败后，会众相继参加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人领导，多次参加起义，此后为反动势力操纵利用。

哥老会崇敬“关圣人”（蜀汉关羽。每年单刀会为纪念日），讲求江湖义气。机构称码头或公口。合江哥老会又称皮会或大帮，始于清代，遍布城乡，仁义礼智信五堂俱全，连县城至福宝途中的幺店子任家坳也有三个堂口。各堂又分排：一排为大爷、大哥；二排称圣贤二爷，只有一人，为德高望重者；三排称三哥，为当家；五排称五哥，为管事；六排称六哥；九排、十排称老幺、幺大，四排因背叛废弃，七八排不设。哥老会要身家清白才能参加，叫“海”（hai）。入会或提升，要找四个成员作介绍，称为恩、承、保、引。会内规矩严格，违者轻的“搁袍哥”（除名），重则处死，有“三刀六眼”、挖坑自埋等刑罚。

民国初期，合江哥老会五个堂共有三十四个公口。其中仁字有十三个，多为士绅军界人物。为了便于总揽城区各堂事宜，还设有“总公社”。首领称总舵把子，县区乡哥老会各自独立，无上下级之分，但彼此声息相通，有事互相支援，庆吊往来颇为密切。组织内“兄弟伙”以大哥为后台，大哥靠“兄弟伙”“扎起”。大哥（舵把子）有较强号召力，在邻封码头、沿河一带吃得开。杀人越货之徒、作奸犯科之辈常麇集于卵翼之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曾先后制定《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暂行条例》及《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程》。民国三十年（1941年）又下达公务员退出哥老会文件。但无济于事。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二月四日，江津匪首孔癞子在合江袍哥大爷王占云庇护下抢劫了“永昌轮”。国民党政府追查再三，最后以三个小兄弟替死了事。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在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合江参加竞选人员利用哥老会，到处宣传活动，拉人拉票，弄虚作假，直至舞枪动刀，仅城区就有六十九个社团参与。何肃雍这个袍哥大爷，就是这样当上国民大会代表的。建国初期，土匪暴乱，其中头目大多数就是哥老会大爷。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何师爷组织部分哥老会人员，响应大足余栋臣领导的反洋教斗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同盟会首领王颖书派人联络会党参加围城战斗。则又是哥

老会成员的另一面。

第二节 大成会

为县属先市、九支一带另一类似哥老会的民间社团，始创于先市，用“以文会友”名义网罗知识分子参加，崇敬“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简称成会。俗称“烟棒棒”。也分五堂。堂下设崇圣学、西河学、北海学、分金学、幼成学五学社。各学社以八个字分排行：崇正学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西河学是屈成行助明幼变化，北海学是宽裕温柔发强刚毅，分金学是达适突忽夜夏随弱，幼成学是先龙在田利见上人。同“学”称世兄世弟，尊上级同仁为老师、太老师。每一堂口内又有大爷、三爷、六爷之分。各码头下设学馆，也称书院或书社，为聚会接待联络处。总头目称主讲，每届任期二至三年。入会者须交码头费若干。活动内容无非在以文会友，切磋学问的名义下，成团结伙与其他社团争夺地方权利。成会与哥老会水火不容，常发生摩擦。民国二十五年前后（1936年左右）先市场两会相争，曾发生杀害人事件。

第三节 青 帮

清代民间密秘结社之一，传说来源于明代罗教。清雍正四年（1726年）由翁雍、钱谦、潘清组织，有严格的帮规，按辈分收徒。为封建行帮游民组织。辛亥革命时在上海设立中华共进会，受袁世凯利用。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利用参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抗战时期又为日本侵略者利用搞汉奸活动。

合江青帮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传入，分嘉海卫、兴五六、行三三个帮。负责人丁其如，为兴五六帮二十三代成员，悟字辈，任正当家师，贾学登为副当家师。城内羊嘴符阳茶社为接头活动地点。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副官郭兰亭受重庆青帮头目张树生委派，来合江发展成员。另有泸县水上警察局长李浓濂也在合江发展成员，任命了县城、白鹿、先市、白沙的当家师。各地当家师为了发展势力，均大量收徒弟。成员中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集青帮、洪帮、哥老会于一身，其影响仅次于哥老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国民党政府曾行文取缔。

第四节 洪 门

又称洪帮或红帮，为天地会对内的名称，清代民间密秘结社之一，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相传以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清朝灭亡后成为民间社团。合江吴绶卿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在上海加入。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泸县稽查处长周迅予来合江嘱吴绶卿组织符合永茶社，作为洪帮活动地点。后以

结拜弟兄方式，推吴为大哥，借此发展成员，但人数不多，无其他活动。时合江中学训育主任赵德华与其兄在校作报告，发动学生参加洪帮，并在正诚茶社“开山门”，结成帮伙。学生施鹏远等积极反对，把赵德华轰出学校。

上述帮会建国后均瓦解。

第四章 会道门

第一节 一贯道

即中华道德慈善会，别名法一天道，真一天道。为具有政治目的，全国最庞大、反动的封建会道门。起源于山东，初名东震堂，为白莲教的一个支系。一八八四刘清虚主办道务，取《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句，改名一贯道。抗战时期被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其后又与汪精卫汉奸政权勾结，日本投降后又为美国及国民党政府利用。

合江的一贯道原是法一天道，为重庆佛堂指挥下的一个支系，道内设有师尊、师母、道长、前人、点传师、坛主、乩手等。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重庆派来点传师吕德富设坛布道，先在白果乡成屋基吴家发展道徒，建立佛堂，指定万朱氏为坛主。万死，由子万云峰继任。同年迁入城内中街开设云峰诊所，以行医为名，设佛堂楼上。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另一点传师来合江，坛址先设天台寺，后迁中街徐家茶馆，不久又迁支家嵒坳（今城关区公所）。同年，一贯道的另一支系真一天道由北京何永良等人传到合江，在城区玄天宫（今前进小学）密秘设坛，发展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李××、哥老会头目付××等为骨干，后建公共佛堂于静阳堂（今合江中学对门）。不久又在小河边源兴木厂设坛。会众不断增多，香火盛极一时。成员中，国民党军、政、警、宪、特、流氓无赖、士绅商贾等无所不有，但以愚昧无知深信神佛群众为多。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夏，一贯道开坛布道，国民党合江县警察局疑为“异党”活动，将点传师及坛主抓捕，后由县参议会议长等人出面说明释放。

建国初，一贯道坛址迁广驿巷，转为密秘活动。道首散播“第三次劫难来临”等谣言，后被人民政府取缔。点传师受到惩办。

第二节 同善社（堂）

又名同善堂，也是全国性的封建迷信组织。县以下组织在“善堂”前冠以当地地名简称，合江称“合善堂”。最早为永川人彭汝尊创立，以劝人修行善道，成仙成佛为名，积极宣扬封建伦理、地狱轮回之说，妄图恢复君主制度，常散播“要出真龙天子”、“甲子年要

大动刀兵”等谣言。成员比一贯道多，且多为士绅商人、军政人物。同善社往往以商业作掩护，开展一地区的道俗事务，总社下分八个号。合江同善社（堂）属大足县龙水镇的“洪信祥号”管辖，号首由彭汝尊兼任。

合江同善堂成立于民国四五年（1951—1916年），初设临时坛于私人家中，后收入道金增多，乃购南街铺房一所设佛堂。稻谷仓中药行、中山路纸火铺、南关上施公馆等处都曾设过佛堂。县以下同善堂有先市、九支、二里、尧坝、凤鸣、车网六处，属县掌管。此外李家巷内设“坤善堂”一所，为女善士举办佛事、坐功、入道的场地。其他同善堂则全是男善士，因而又有“乾善堂”之称。

同善堂重内功修养，信念是：“知止无善，存性存诚，入世出世，了死超生”。入道者须举行劝化点道，宣誓，传授坐功德行仪式，并须捐善款和“护道金”。初入者名众生。首领称“统领”，其下为号首，尊奉神祇只有一个，名“无生圣母无极天尊”。每年举办三次大型龙华会及一次祖师会，利用会期提升恩职，吸收新会众。同善堂初设时也做施舍寒衣、棺木和医药等事，所施疯狗药有特效。但却经常煽动“大劫临头”、“真龙天子要出现”、“弥勒佛（燃灯佛）管天下”，并借“普渡众生、广结善缘”骗取钱财。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曾禁止活动，但不久又死灰复燃。国民三十二年（1943年）曾明令解散。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永川洪信祥号派张义声来合江发展会众，国民党探知，认为“洪”字偏旁的“氵”是“川”字的变写，加上“共”字就是“川共”的代号。于是国民党合江县特别行动委员会秘书李金梁，同警察中队长李铁夫等，率警士多人到同善堂捕人，殊知张已离去。其后活动遂停止。

第三节 从新慈善会

为四川威远县新盛镇巫婆朱郑氏于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创立，初称朱幺婆教。民国七年（1918年）更名为十全慈善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信徒愈众，又改为川南慈善联合会，会址设泸县贵州会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发展到川东，更名为川东南慈善联合会，总会址设威远新盛镇静宁寺。

合江从新慈善会，民国十四年（1925年）成立，会址先设在天后宫，后迁水神庙，最后迁北门口。原为独立机构，民国十九年（1930年）始归川南慈善联合会所属泸县分水岭第七办事处领导。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改为川东南慈善联合会合江第十四分会办事处，在九支乡大井坝盘龙山建立分会，下属十七个小分会。其中本县十四个，贵州省赤水县城内及复兴场、四川叙永县的马草坪三个小分会也属管辖。会内设正副会长、主礼、坛生、收支、劝募员等执事人员。经费靠募捐，各小分会每年缴常年捐于分办事处，再由各办事处汇缴于总会。

从新慈善会以宣扬封建迷信，劝人行善为宗旨，开展诵经拜忏、举办醮会、施孤济贫、救灾放赈等活动。通过讲“圣谕”、说“善书”等方式宣传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并搞“扶乩”、“飞鸾”，假托神灵，欺骗愚弄群众。民国二十四年，大桥乡慈善会做四十九天大斋，一黄姓老寡妇家资富裕，儿媳早亡，只有一孙年幼。慈善会长郑曲江贪图黄氏家财，在会期用药将黄氏孙子毒死，并装鬼神附体说：黄氏孙儿是非凡人物，玉皇大帝诏